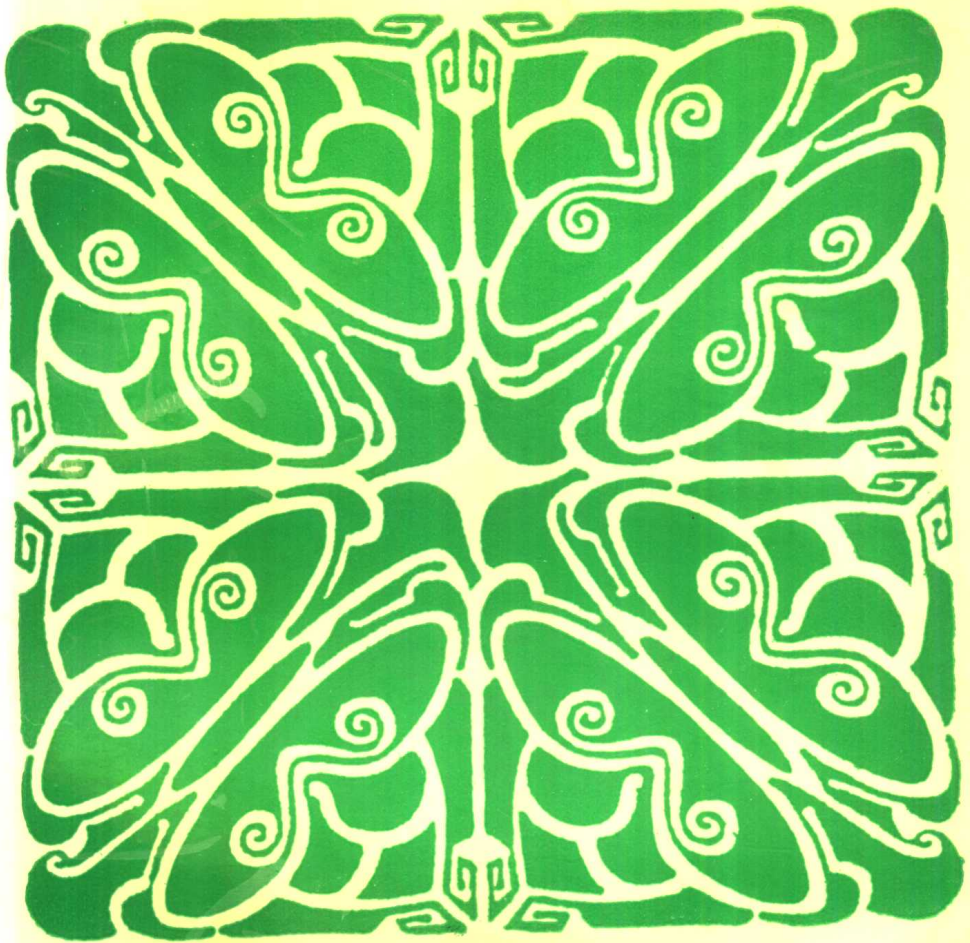




SINOLINGUA



张德鑫 著



中外语言文化漫议

中外语言文化漫议

张德鑫 著

华语教学出版社
北 京

(京)新登字 134 号

责任编辑 蔡希勤

封面设计 朱 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语言文化漫议/张德鑫著.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8

ISBN 7-80052-296-2/H·621(外)

I. 中…II. 张…III. 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文集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511 号

中外语言文化漫议

*

©华语教学出版社

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

(中国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北京邮政信箱第 399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国内发行

1996 年(大 32 开)第一版

(汉)

03100

9-C-3112P

441-371
108-1
2:7837

序 言

张德鑫先生将自己的部分文集册成书，嘱我作序。因为所收论文有不少是谈对外汉语教学的，或者是跟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我的序自然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了。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实际上属于第二语言教学，教学目的是使学习者掌握汉语这个交际工具，用它进行得体的跨文化交际。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过程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技能的训练过程。既然是一种技能训练，就必须突出实践性原则。学习语言就好比学游泳，只有通过练习才能掌握。游泳教练的主要任务是告诉学生游泳的方法，鼓励他们大胆下水，指导他们刻苦练习，让他们通过实践掌握游泳技术。如果教练只讲理论，而不去引导、鼓励甚至强迫学生下水进行大胆的实践，就不可能使学生学会游泳。同样，语言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指导学生进行语言实践，让学生通过练习掌握语言。语言教师如果只是讲解语言理论，而不指导学生进行练习，就不可能使学生学会语言。

当然，掌握一种语言比学会游泳要困难得多，上面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主张突出实践性原则，并不是鼓励盲目实践，而是要求在对客观对象做出精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有理论指导的自觉的实践。这里所说的客观对象，主要是

指汉语、学生母语、语言学习心理以及跟语言学习和习得有关的其他因素，对这种客观对象的研究就包括对汉语、学生母语、语言学习心理的研究以及与这些研究密切相关的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研究。只有通过这种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才能揭示出语言学习和习得的客观规律，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自觉的实践。

语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文化信息的一种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深深地打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印记。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学习一种外语或第二语言，除了要学习这种语言的形式结构和语义结构以外，还必须学习它的文化内涵。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认为，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是语言教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也有人只是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看作文化现象，而对隐含在语言和语言交际中的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因素往往视而不察。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已开始重视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交际文化”的讨论，使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发展，这也表明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张德鑫先生这部书中既有语言对比的论文，也有文化对比的论文，而且往往是把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紧密地结合起来，为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在笔者看来，这些论文都是对比研究的佳作，特别是《貌合神离，似是而非——汉英对应喻词中的‘陷阱’》、《汉语词语文化上的不对应》、《数字吉凶象征的中外不同文化审美因素窥探》等篇，见解精辟，也显示了作者对汉英两种语言理解和掌握的深厚功底。这些研究成果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读后得益良多。从语言教学的角度说，这种对语言和文化本体对比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

为可以为“中介语”和“中介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方面的理论依据；其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可以直接应用到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中去。

张德鑫先生是一位思维敏捷、治学勤奋的学者，在担任大量行政和教研工作的同时，又不停笔耕，成果丰硕，建树显著，堪为榜样。在作者又一部新著即将面世之际，谨以贺代序。

吕必松

1995 年 9 月

前 言

对外汉语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业务素质和知识结构，专家们有精辟论述：

吕必松先生（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学院前院长）：“对外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特定的智能结构：他们不但需要精通汉语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而且需要熟悉一两种外语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还要掌握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但需要具备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教学法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熟悉中国和外国有关文化知识。”（《对外汉语教学探索》第165页）

王还先生（我国资深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前辈）：“对于一个语言教员的好坏，他们（指外国学生——引者）是评价得了的，究竟在你倒给他那杯水的后面是一大桶水，还是只有两三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的。”（《门外偶得集（增订本）》第181页）

胡明扬先生（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和文学是很难分家的。我认为，语言和文学合则兼美，分则两伤。我

不相信只学几条语法规则就能学好一种语言，而认为只有熟读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掌握这个民族的语言……一个人同时精通语言和文学在过去也许是平常事，可是现在语言和文学彻底分家，这样的人就很少了……我希望这样的人多一些，这对促进对外汉语教学肯定有好处。”（《中国古典文学概观·序》）

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笔者有幸在国内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和经验中，充分感受到了上述专家所言之正确、实际和深刻。尤其在国外任教、讲学及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时，不仅开设了各门汉语课程，还要求用汉语或英语讲授中国文学和举办有关中国文化的各种讲座。更不易应付的是，海外同仁中除语言学家和汉语专家外，还有研究儒、道、禅的汉学家，甚至有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或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各类专家学者，他们常找上门来“切磋”学问，邀请或求助搞点什么，这就要求自己必须在教学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笔者目前所担负的工作专业性很强，要想不当外行，避免临阵磨枪，并赢得工作的主动权和发言权，也促使自己必须勤实践多体会。《汉书·董仲舒传》：“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荀子·劝学》：“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故这些年来工作之中之余每有所感所得，笔耕未敢稍息。

承华语教学出版社厚爱，从笔者这些年发表在各报刊论文集中的学术文章中选出 42 篇结集出版。收入本书的文章长短不一，最长三万余字，短则仅千言，所涉从语言到文化，大致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汉语研究、汉外对比研究、翻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等。其中有些文章在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近年，笔者比较集中于数字文化的探索，已发表十多篇论文，并已被列为由冯天瑜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化书系》之一（书名

《数里乾坤》，待补充整理后将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本书仅收其中两三篇以见一斑。

吕必松先生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谨此申谢。

囿于水平，失误难免，敬希惠正。

张德鑫

1995年12月

目 录

一. 从“雅言”到“华语”	
——寻根探源话名号	(1)
二. 对对外汉语教学本质之认识	(13)
三. 教学对象·习得过程·文化差异	
——小议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专门学科	(44)
四. 张志公与对外汉语教学	
——纪念张志公先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 50 周年	
.....	(50)
五. 电视汉语教学片的原理和设计	
——兼说《你好, 北京》	(61)
六. 汉语的地域差异与对外汉语教学	(71)
七.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研究	(78)
八.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举要	
.....	(93)
九. 1991 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要	(98)
十. 1992 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要	(102)
十一. 1993 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109)
十二. 谈汉语的“正反词”	(119)
十三. 谈颠倒词	(126)
十四. 谐音异体词语浅说	(147)
十五. 语言文字和统一大业	(149)
十六. “中国”的古称	(152)

十七.	“中国”与“中华”	(156)
十八.	关于“中国”的译称	(159)
十九.	“海关”无海 “老外”不老	(168)
二十.	谈汉语外来词	(171)
二十一.	第三次浪潮	
	——外来词引进和规范刍议	(186)
二十二.	汉英词语文化上的不对应	(200)
二十三.	貌合神离 似是而非	
	——汉英对应喻词中的“陷阱”	(218)
二十四.	黄与蓝	(230)
二十五.	红=green (绿)	(233)
二十六.	翻译与语言文字应用	(236)
二十七.	汉译取字用词漫品	(250)
二十八.	作品译名絮语	(263)
二十九.	中国文学名著外译漫话	(266)
三十.	翻译中的文化透视	(270)
三十一.	汉英“正反译”例说	(274)
三十二.	“圆”字文化说	(293)
三十三.	对称与汉文化	(301)
三十四.	生肖文化探	(304)
三十五.	蝉文化探微	(318)
三十六.	从圣灵到贱物	
	——中国龟文化的沉浮	(322)
三十七.	华夏鱼文化管窥	(328)
三十八.	数字吉凶象征的中外不同文化审美因素窥探	(335)
三十九.	数字姓、称、名	
	——汉语数文化奇观	(353)
四十.	汉字文化中的序数美	(361)

四十一．唐宋诗词中的“水”…………… (389)

四十二．南怀仁

——中比交往史上的一位先驱者…………… (428)

从“雅言”到“华语”*

——寻根探源话名号

缘 起

中华民族使用的共同语或标准语，历来有诸多不同名称，如：雅言、汉语、官话、国语、普通话、华语等。

一物多名，难免有不便和弊端。近年来，为汉语“正名”的呼声不断。如：张拱贵、王维周先生著文主张“应该恢复使用‘国语’这一科学名称”，^①新加坡国立大学陈重瑜教授认为“‘华语’一词最为清楚、明确，涵盖面也最广，指的是华人的共同语，包括了汉满蒙回藏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又超越了地缘上的限制。因此，以‘华语’一词概括普通话及国语可以说是清楚又周全，更何况‘华文’一词已被广泛地使用了”。^②对此，国内不乏响应者，并“期待着学术界能够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③笔者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也对目前所使用的“对外汉语教学”名称颇有异议，希望能“正名”。^④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名称术语的形成、变化、消亡，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约定俗成的，并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故在

* 原载《汉语学习》1992年第5期。

是否需要及能否实现“正名”之前，追溯一下这些不同名称的演变过程，也许能从中受到启迪，看来这是一项必要的“基础工程”。

雅 言

汉民族最早的标准通用语，可远溯至三千多年前的“雅言”。《辞海·雅言》：“古时指‘共同语’，同‘方言’对称。‘雅’有雅正的意思。”杨伯峻先生也明确指出“雅言，当时中国所通行的语言”。

雅言，实指周朝国都丰镐（今西安西南沣水东岸）地区的语言。作为周王朝“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丰镐话被视为典雅、规范、纯正的语言。正是借助这镐京雅言，全国才能方便沟通交际，“中央”才能有效控制地方。在我国语言史上，以首都方音作标准语音，此时已开先河。

周、秦后随着改朝换代及京城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亦随之不断被重新“雅正”变化，但仍以各代京城语言为标准语。如秦和汉之关中话、唐之长安话、宋之汴梁话等，先后为各代之标准雅言。金、元、明、清皆定都北京，全国通用的雅言自然非北京话莫属了。故“雅言”即后之“官话”、“京腔”、“普通话”。

汉 语

溯“汉语”，必先说“汉”，一部中华文明史离不开这个“汉”字。

汉，最初是流淌在华夏文明发源地的一条河名，即今之汉水。《诗经》中屡有提及，如《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孟子·滕文公上》亦云：“决汝、汉，排

淮、泗，而注之江。”由河名生发出“汉中”、“汉皋”、“汉阴”等地名，甚至把天上的银河也联想称之为“汉”、“天汉”、“云汉”、“银汉”、“河汉”，故《诗经·小雅·大东》早就有“维天有汉，蓝亦有光”句。足见古人对“汉”名之崇仰。

公元前206年，刘邦抢先入关灭秦占据汉中一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刘邦打败项羽建汉朝，从此“汉”由河名、地名变为国名，并称汉朝人为“汉人”，匈奴更将勇武的汉人尊称“好汉”。至金朝，“汉”被作为正式的族名冠于汉族。后元、清两代的外族统治者，亦将以汉族人为主体的民族统称“汉人”。

自汉代始，将汉朝和汉人的语言称作“汉言”。汉末僧人翻译的佛经，即以“汉言”跟“胡音”（指梵语）相对照。关于“汉语”两字连用，最早见于《后汉书·荀爽传》：“（爽）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但此处“汉语”乃书名也，非指语言。考“汉”和“语”合为一词指汉族语言，最早之记载为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言语》：“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其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句中“高坐道人”指晋永嘉年间东来之西域僧人，他不会说汉话。可见魏晋时的语言也被称作汉语，正如刘莫先生在《汉语词汇史随笔》中所指出的：“‘汉语’这个词的意义，最初指的是汉朝人的语言，后来发展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故“汉语”遂不限于汉代，从南北朝起为历代所通用。

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十一年》：“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

上引朝鲜李朝成宗十一年为明代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老乞大》和《朴通事》为当时朝鲜人学汉语的两部教科书，全按北京语音、词汇、语法体系而写的，也许可算是最早的“普通话”对外汉语教材。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汉语”这一名称自然也可被理解蕴含

着对中华已族自己语言的自豪和热爱。而“汉语”被正式认作是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并取代了诸如“官话”、“国语”等别称，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官 话

所谓“官话”，即“官方语言”，指官员在公务活动中使用的并能让各地人士都能听懂和运用的标准语。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需要有一种标准语，因此，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变得越来越重要。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序》中的描述，那时云南的车马可直驱辽阳，东北的官吏也常进关至冀鲁等地，足见当时交往之广泛密切。这必然加速了对标准语的确认和推广，“官话”便应运而生。

有别于方言土语，“官话”作为标准通用语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明代张位《问奇集》中：“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官话”一词虽起自明代民间，但官场亦颇盛行，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称，王雅宠“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语”；《明史》也载，夏言“不操乡音”。至清代，“官话”便由朝廷直接下令推广了。各地专门设立了教学官话的“正音书院”，使官话成为公众用语。俞正燮《癸巳存稿》对此有较详记述：“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当时还规定举人以下各级考生若官话不过关，就取消其“升学考试”资格。这恐怕比我们今天推广普通话的措施要严厉得多。说到这里，现在那些连普通话还都不太会说的人居然也教外国人学汉语，不知作何感想？

清朝推广官话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促成清代小说创作登上我国古典小说的顶峰。《红楼梦》的广泛流传，除作品本身的巨大思想、

艺术价值外，还跟“全书通体皆操京语”分不开。

“官话”又称“京腔”，由此产生了英语 Mandarin 一词，指清朝官员，也指中国官话或京腔。据考，Mandarin 实际上是汉语“满大人”的对音。鸦片战争后中英官方谈判时，英方的会议记录指中方发言时总用 Mandarin 称满清官员，这些满大人说的话自然就是操京腔的官话了。但官话、京腔不等于国语、普通话，何况 Mandarin 在英语中还派生出泛指墨守成规的官员、守旧的政党领袖等贬意，故今天若再用 Mandarin 作为“汉语”或“普通话”的英译，既不准确，还不免蒙上历史的尘封和污浊。事实上，“官话”之称在清末及民国以后，即为新名称“国语”所替代。

国 语

“国”和“语”两字连用，最初也是书名，即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之《国语》。这是一部先秦分国记事的史书，包括《周语》、《鲁语》等共二十一卷。这里的所谓“语”乃指当时各地历史人物的言论，非指语言的术语。

“国语”一词用以“指本国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现代汉语词典》），是在近代列强打开了封建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后，国人才从固有的朝代及地域观念上升到了国家意识，从而要为国家、民族的共同标准语正名。据说“国语”一词是从日本引进的，日语对日本人民自己来说叫“国语”，而对外国人来说则称“日本语”，一语两名。最早正式用“国语”替代传统名称“官话”的，是主张用拼音统一语音的近代语言学家江谦，这位清末资政院议员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上书了一篇《质问学部分年筹备国语教育说帖》，题目中就出现了“国语”一词。

辛亥革命后，1913年成立的“读音统一会”召开全国会议，会议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即“国音”；还议定了拼注“国